

引 子

1970年12月22日，邓颖超同志通过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的机要电话，直接与上海市委社调部韩仰山部长联系，告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已第二次提出恳求，要见“王牧师”的面，请作好一切准备。韩部长听罢，真是喜出望外，这是他想做而无法做的事。“文革”中，“王牧师”两次给他写信，祈求得到保护，可自己是个“走资派”，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眼睁睁看着应当保护的人被批斗、被毒打、被关押。现在邓大姐出面，似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但他又很为难地回答邓大姐说：“王牧师病重，危在旦夕，连医院都不让住，怎么办？”立即组织抢救，哪怕“王牧师”的生命能延长一个月，乃至一两个礼拜，能与斯诺见一面，交谈一次，就是你们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邓大姐代表中共中央下了这道命令。

当天，一辆救护车呼啸过市，停泊在上海淡水路92弄1号门口，车上跳下几位救护人员，说

是要将姓董的老人接到医院里去。“去医院？”老人的家属有些纳闷，“今天早晨，才从东方红医院（现恢复原名瑞金医院）观察病房回家，说是胃癌晚期，不允许住院。”“那……可能是误会。”领头的一位医生回答，“现在接到市委通知，要抢救老人，说是重要的政治任务。”

这一回果然大不相同，救护车将老人接到医院，立刻送进一间窗明几净的单人病房。老人受到特殊照顾，医生、护士不间断地会诊、护理，输注了大量血浆，还给老人服用了昂贵的抑制癌细胞扩散的药品。偶尔，老人微微睁开眼睛，扫视周围。陪在身边的二女儿惠芳，见老人似有好转，欣喜若狂，对老人轻轻地耳语几句：“这是邓大姐、韩部长为你安排治疗、休养的，斯诺还要来见你呢！”老人听得懂，心里很明白，但不能说话，嘴唇略微颤动了一下，眼泪夺眶而出。此时此刻，他似乎在想，尽管我被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历尽劫难，但最终党还是没有忘记我，在我病危之际，又这么关心我，我将再次昭雪，知足矣！他似乎在想，过去为党的事业披荆斩棘，无愧一生；他似乎在想峥嵘往事，思念领导、战友周恩来、宋庆龄、李立三、李维汉、王世英、陈赓、刘鼎、刘仲华、浦化人……思念共事过的好友冯玉祥、张学良、李杜将军，当然，在病榻上想得更多的是他牵肠挂肚的外国朋友斯诺，如今总算还有机会能见最后一面。

无奈老人的病情实在太严重了，尽管医护人员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病魔还是无情地夺去了老人的生命。同年 12 月 25 日，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 79 岁。他一生中最大的夙愿想再见一面斯诺，未能如愿以偿！

后来，人们渐渐知道，这位老人原来就是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过的神秘的“王牧师”，

他的真实姓名叫董健吾（化名周幽谷，是采用它的谐音“忧国”的意思），也曾是中共一名高级特工，从虔诚的教徒转信共产主义，出入瓦窑堡屡建奇功，在白区创办红色“摇篮”，抚养过毛泽东的儿子及其他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多次营救革命同志，策反国民党将领起义等，是一个少为人知的、处在大幕后面的无名英雄。

青浦镇上的董家大院

1891 年农历正月初五，正是神州习俗“迎财神”的一天，董健吾呱呱落地，生于古城青浦县东门棣华桥一户小康人家。出生之日，左亲右邻簇拥道贺，有的说这孩子是财神爷在龙年赏赐的“龙子”，将来必定大富大贵；有的说这孩子长大了准是奇人奇才，必成大器。他的父母也高兴得合不拢嘴。惟有孩子的祖母没有为娓娓动听的话打动，她笃信基督，相信上帝会赐给她一个好苗苗，但好苗还得有雨露滋润，还得园丁扶植培育，否则最最好的苗儿，也无济于事。于是她发誓要花尽心血，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初生的孙儿培育成一个有用之人。

董健吾的出生地青浦县，原属江苏省，1958 年才划归上海市。青浦地处上海西郊，总面积约 678 平方公里，地势平坦，地下水位较高，东片河港交错，西片湖荡密集，水面积占 2.6%。西北部是跨越青浦、昆山两县的淀山湖，湖水清澈如镜，

方圆近十万亩，水产丰富，是上海市郊最大的淡水湖泊和重要的旅游风景区。全县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民风勤朴，物产富饶，是名闻遐迩的鱼米之乡。又据考古发掘，在这块土地上有6000年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遗迹，因此，青浦也可谓是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

董家是青浦县的一个世族。董家大院在县城东门外，它是一栋五进见深、古色古香的木瓦结构的平房，房外两侧，筑着篱笆，攀着老藤，古树参天；门前一座玲珑剔透的小桥，桥名“棣华”（因桥而得地名），桥下是清澈见底的小河，景色秀丽。

董健吾的祖父生于清朝道光年间，在好几个地方当过县官，颇有几分学识。祖母沈董氏生于1840年。这对夫妇只生一子，名叫董守之，是个平庸之士，娶蔡氏为妻，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董羊生（小名），小儿子即董健吾（小名梅生，学名选青），兄弟俩相差14岁，可称大兄和小弟。董羊生膝下有三女一子，因他早亡，他的儿子董寿朋在就学年代就靠叔父董健吾抚养培育。1915年，董健吾与黄慧光成亲，得二女二子，即惠芬、载元、惠芳、寿琪。1931年董、黄离异，继而董与郑兰芳结为夫妻，生育四子三女：霞飞、云飞、鹏飞、龙飞、静云、静芳、静芝。

董健吾的祖母董沈氏出生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思想开明。她的弟弟沈书揆是早年上海教育界名人，上海名牌学校——南洋模范中学的创始人、首任校长。董沈氏精明能干，以“沙船”起家。所谓沙船，就是用船运沙、石等建筑材料。清代一个女流之辈敢于涉足男士都视为畏途的行业，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这种产运一条龙操作、时间性强、水上作业危险性大的行业，没有办事魄力和组织调度才是根本无法驾驭的。当时，上海地区的经济正在大力发展中，社会对建筑材料的需求量很大。

董沈氏经营沙船有方，搞运输很出色，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而来。董家就此更兴旺起来，买田造屋，囤粮储银。董沈氏还出钱为丈夫捐官。当时，这个董氏大家庭实际上是以董沈氏为中心的。董健吾的祖父过世后，董沈氏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董沈氏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她创业经营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发挥助手和下属的作用。她善于待人、用人，因此，下面的人都心悦诚服，尽心竭力地为她效劳。按照青浦乡间的习俗，造了新宅后，大厅里要挂上横匾，匾上要雕刻金碧辉煌的堂名。她征求家人和亲友意见后，把大厅取名“安仁堂”，顾名思义，就是要安家立业，以仁义为本。这和她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吻合的。她平素富有泼辣、实干、好强的精神，同时又宽厚待人，有一颗侠义之心，能同情帮助有困难的人，把周围的人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合力。如果说董家大院的兴起，为董健吾的教育成长提供了物质基础，那么董沈氏的哲学思想、性格风范则对董健吾日后所走的道路产生极大的影响。

随祖母踏进基督教门

1900年，还是清光绪年间，有一位西方牧师不远万里来到青浦布传基督教，随同的还有一名女传教士，乡里人都称她为鲍小姐。他们初来乍到，人地两疏，不要说传教，就连找一个合适的栖身之处也困难。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他们得知董沈氏嫁到青浦董家前，早已在上海受了洗礼，入了基督教，是一名虔诚的教友。那位牧师如获知音，立即登门拜访董沈氏，祈望她能助一臂之力，诸如提供临时性的布道场所，帮助解决膳宿问题等等。董沈氏沉思片刻后，一一允诺。她觉得其他一切都好办，惟一使她颇费思量的是鲍小姐寄宿哪家乡邻才合适，她不知道这位洋小姐性格是孤独还是开朗，她做客异国能否入乡随俗……当董沈氏见到鲍小姐时，她的疑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原来这位女传教士才二十七八岁，白皙的脸蛋，挺拔的鼻梁，眉清目秀，一笑一个酒窝，这位洋小姐还会说简单的中国话，仪表端庄大方，言

语慢条斯理。不知怎的，她俩没说上一个时辰，在外人看来，好像已是相识许久的忘年之交。很通人情的鲍小姐，在对话中已明白老人的意思，她表示不管住在哪家，都能适应相处。董沈氏微微点头，若有所思，她想自己膝下无女，何不让洋小姐住在自己家中，并收她为干女儿呢？主意一定，董沈氏连说带用手指划，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鲍小姐高兴不已，这样她既有了合适的住处，又有了一位中国妈妈，何乐而不为呢。她对着董沈氏行了个 90 度的鞠躬礼，亲昵地喊了声“妈妈”，接着“母女”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从此，董家与基督教有了更多接触，鲍小姐也成为董家的一员。董沈氏还真的把鲍当成掌上明珠，百依百顺，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而且还把孙儿的学习托付鲍辅导。一天，董沈氏问鲍：“玉不琢，不成器，这句话懂吗？”鲍摇摇头。董沈氏接着说：“选青（董健吾幼时的学名）是我最爱的孙儿，是棵好苗，但要培养。他现在青浦圣公会小学上学，我要他也信教，学西方文化，进高等学府。”鲍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好，我现在给闺女一个任务……”还未讲完，鲍抢着问：“什么任务？”“今后你要把选青当作自己的孩子，教他英语，教他西方文化，教他教义，行吗？”“妈妈的话，还能不行！”鲍爽直地回答。

从此以后，鲍小姐就成为小选青的家庭教师，她非常喜欢天赋聪慧的选青，一有空闲，除灌输一些教义外，还教授英语。这样持续近两年，幼时的董选青英语水平突飞猛进，已能与鲍小姐熟练地用英语对话。当鲍小姐离别董家大院时，她还推荐选青到苏州一家教会办的桃坞中学上学。董在这所学校里入了教，他好学求上进，注重锻炼身体，认为一个有志者必须具备健壮的体魄，才能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健吾”这个名字就是他后来为自己取的，实际上也反映了他的一种朴素的教育观念，

主张青少年应德、智、体全面发展。有一次他和一些伙伴踢足球，无意中击到了一个外国人，当即把那个老外送进医院治疗。那个老外发现眼前这个中国乡间孩子竟能用英语对话，大为惊诧，于是跟他结识，并保送他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读书。这次经历使他与圣约翰大学结下不解之缘。1911年他从圣约翰大学附中毕业后，董沈氏不顾学费昂贵，取出部分积蓄，送孙子进入圣约翰大学就读。

董健吾从小在青浦生活时，就看到乡间百姓的困难。他对穷苦辛劳的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心。乡间生活和都市生活的对照，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汇，各种思潮的冲撞，使董健吾才思纵横，视野开阔，而且求知欲强烈。他学的是理科，但他对文史、哲学也很感兴趣。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开始考虑中国这样一个有一流文化的文明古国，到近代为什么会落到如此衰败的地步。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何在？正是因为清廷的日趋腐败，偌大的中国，会被西方列强任意侵略瓜分，民众被讥讽为“东亚病夫”。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黎民百姓的文化水平低，相当一部分人还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有鉴于此，他认为中国要富强起来，还得靠全民族提高文化素质，从国外引进先进文化和科学知识。作为率先接触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董健吾立志要用学到的知识为广大民众服务。

据乡里人回忆：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从上海把电影送到青浦去放映，当时还只是无声电影。推算起来，他该是中国第一个把电影送到乡间去放映的人。有一次，他乘了一条小船，把电影放映机和无声电影胶片送到家乡，要让乡亲们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活动影戏”震动了整个青浦城乡，使一些青年人开拓了视野，启动了他们的进取心，其中有的人也和董健吾一样，走上了追求知识和进步的道路。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是一个美国人，也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为笼络师生员工，常设家宴款待，董健吾也是他家里的座上客。董健吾性格活跃，学的是理科，但英文很好，口语是全校的尖子，由于幼时的“童子功”，美音非常纯正，如不见其人，只闻其声，还以为是美国人在说话。在学校里，他对体育也很感兴趣，恰如自取的名字，他身体魁梧，是学校的跳高冠军，他最好成绩是 5.7 英尺高度（相当于 1.70 米）。他也是足球队主力，与马约翰都是学校的体育积极分子（马先生后成为国内著名体育教授）。更有趣的是他还结识了一位西方魔术教授卜德能（Putnun），继而对“变戏法”的玩意儿上了瘾。他跟着卜教授学了很长时间，尤其是手技方面有了很深的功底。卜舫济非常赏识董健吾这位“文武全才”，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为此，卜舫济一再说服董健吾去“约大”神学院进修，祖母董沈氏也极力鼓励。于是，董健吾又多读了两年神学，有了双学士的毕业文凭。

在董沈氏的影响下，董家全体信奉了基督教。除董健吾外，其他的成员仅仅是一般的虔诚教徒，惟董健吾在日后成为活跃在神坛前的神职人员——牧师，在当时教会系统和教友中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替董家特别是董沈氏增添了光彩。这样一个“中局”，对祖母董沈氏来说是极为满意的。但董沈氏万万没想到她的孙儿后来竟然会弃教从政，成了“败家子”。

“约大”同窗挚友浦化人

在圣约翰大学求学时 董健吾有不少朋友。其中交往最深的要数浦化人。董、浦二人在“约大”为同级同学，董健吾主修理科，浦化人主修文科，在神学院浦比重高一年级。两人住在同一宿舍，政治思想比较激进，情趣相投，所见略同。每于功课之暇，或散步校园，或抵掌宿舍，议论时政 畅谈国是。他们在一起为武昌首义报捷 为辛亥革命胜利而欢呼，为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惋惜；又屡屡拍案而起，痛斥袁世凯专权误国，媚外事件迭起……浦化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强烈，对清廷腐败，丧权辱国，对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非常气愤。每当看到上海一些公园悬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浦化人就特别愤怒地说：“在中国的土地上 居然不许中国人进入公园，而且把中国人与狗相提并论，这完全是对我们中国人莫大的侮辱。”董健吾对此也深有同感。浦化人比董健吾年长四岁，他对董

健吾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他是董健吾后来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浦化人，字虎臣，乳名培林，教名保罗（曾用化名周念椿、张绳初、王养三等），1887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南门外东绛乡石塘的一个商人家庭。浦父长期在上海经商，浦化人6岁随父迁居沪上，就读于私塾。13岁那年正逢庚子之变，父亲因商业经营受挫忧郁而病死，从此家道中落。浦化人去崇明一家百货店当学徒，劳作之余发愤自学。1908年夏，他进入上海一所英文夜馆——尚德学校，一年后又转赴苏州报考桃坞中学被录取。早在尚德学校时，浦化人就开始阅读《圣经》，从此与基督教结缘。在桃坞中学，他不仅受了洗，还萌生了终生传道的想法。1911年夏，浦化人因成绩优异被桃坞中学保送上海圣约翰大学为免费生，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毕业后，由圣公会江苏教区部斐蔚派遣，到无锡江苏圣道书院执教。1915年9月25日，浦化人在上海圣约翰堂受会吏之职。他在1920年前发表过《半生之回顾》、《穷人万幸论》、《基督教救国论》三本小册子，这些册子成为当时江浙一带颇为畅销的传教品，奠定了他文字布道家的地位。他因此也成为有名气的教会才子。

1916年，跨出校门才一年的浦化人得到了一次施展抱负的机会。早在1912年，在华的英、美、加圣公会代表聚集上海圣约翰大学，决定将三会的名称统一为中华圣公会，要集中全国圣公会的人力与财力，在国内开辟华人自己牧养而不仰赖西方教会的新布道区，意在把基督教的洋教形象逐渐改为本土化的宗教。1915年中华圣公会第二次会议确定把历史上景教的圣地西安作为传教区的中心，在无锡执教的浦化人，一听到西安布道区征募传道人的消息，立即应募。1916年8月27日，圣公会华北教区鄂方智在北平座堂升浦化人为会长，并举行饯别大礼。

拜，为浦化人夫妇、葛丕原和陪同他们前往西安的传道部新任总干事郑和甫送行。陕西牧区的开创颇为艰辛，缺地、缺房、缺钱、缺人，为了打开宣教局面，他们到西安后于当年 11 月 1 日开设英文补习馆，以教授英语作为宣传的媒介，后来补习馆学生增多，逐步发展为圣公会西安中学。

1922 年和 1925 年浦化人先后两次投奔冯玉祥，作随军牧师，1927 年 4 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至 1935 年浦化人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英文翻译，1935 年 3 月任中共上海临时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①，1937 年 9 月进入延安。到全国解放前历任党中央英文翻译、延安新华社社长、晋冀鲁豫最高法院院长、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解放后历任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协委员等职。

浦化人在“文革”中也惨遭劫难。他在卧病 4 年后，于 1974 年 11 月 15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应家属的要求，浦老的骨灰已迁至家乡无锡的革命烈士陵园。

注释

① 1934 年和 1935 年中共上海局连遭敌人破坏 其主要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等先后叛变。1935 年 3 月，第三国际驻沪代表团指定刘仲华、贺昌炽、浦化人为临时上海局委员会委员 其中刘仲华为第一书记兼保卫局与统一战线负责人 贺昌炽为组织部长 浦化人为宣传部长。

到扬州、西安办学去

按照卜舛济的安排，董健吾从神学院毕业后，便去扬州圣公会办的友基小学任校长，并在美汉中学当教员。

从 1917 年至 1920 年，董健吾在扬州教会工作了 3 年多。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对董健吾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9 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参加协约国一方的中国政府，派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 7 项要求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会议的拒绝。会议竟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般的在北京兴起了。后来，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各大中城市的工人纷

纷罢工，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广大工人。

五四运动使董健吾开始认识到中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不彻底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独立起来，还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欺侮和压迫，他对学生、工人的爱国运动深表同情。爱国学生和工人掀起的抗议声浪，推动这位刚涉足社会的富有良知的青年牧师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拜西方为师，而老师总要欺侮学生？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当权者对平民百姓作威作福，而在洋人面前如此软弱无力？基督教能不能救中国？中国的彻底独立和富强文明，到底应该走哪条路才能达到？董健吾觉得，一切爱国有识之士应该重新思考和探索救国的真谛。

由于陕西牧区急需传教办学的骨干人才，卜舫济于 1920 年又指派董健吾去西安中学担任校长。浦化人也写信动员董健吾来陕主持该校校务。董健吾欣然从命，因为他可以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施展他传教办学的才华。同时，又可以联络老友，结识新朋，拓宽视野，增进见识。当然，西安是秦、汉、唐历代皇朝之都城，留下举世惊叹的灿烂文化，是他早就向往的地方。

董健吾到西安传教办学完全是得心应手的事。一是他在社会上办学布道已有三四年，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二是老友浦化人先行了一步，他得到了浦的大力支持和融洽合作；三是他人缘好，领导有方，有带头实干精神，能协调好校内外各方面的关系；四是他兼任教员，善于把知识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地传授给学生。学生们都喜爱并敬佩这位笑容可掬、精力充沛、年轻有为的老师、校长。董健吾把在校的教职员工紧紧团结起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校越办越好，一时名声大噪，成为当地的名牌学校。

为拓展“燕大”作出贡献

前文说到卜舫济在“约大”相中董健吾，要培养他当接班人。在董毕业后，先指令他到扬州、西安的中小学当教员，再任圣公会办的西安中学校长，让他先实践一番，镀上一身金，然后荣归“约大”，担当大任。董不负卜校长之所望，特别在西安教学有方，传道得力，上下融洽，左右贯通，结识了不少地方达官贵人和洋人，其中就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何许人也？就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那篇著名文章中抨击的那个支蒋反共的驻华大使。人们只知道他是个政界人物，在抗日时期坐过牢，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做了驻华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人民的内战等等，但并不了解他还兴办了北平燕京大学。

1920年，有一天，司徒雷登特地到西安中学拜访董健吾，他俩忽而以英语交谈，忽而用中文

对话，煞是投机。寒暄一番后，司徒雷登言归正传，向董提出：“据说先生与陕西督军陈树藩有莫逆之交，我想拜托先生与督军商量一下，可否将督军在京城所置勺园割爱。”

“不知司徒先生置勺园作何用？”

“实话实说 我想把燕大与勺园连起来 使扩展后的燕大赶上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

“那么司徒先生对置园费用作何打算？”

“噢 我已从国内携带 20 万美金，只要督军愿卖，费用不成问题 还可追加。”

董健吾明白了司徒雷登的意图后，觉得自己为买卖勺园从中斡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董健吾对勺园的地势以及历史沿革略有所知。该园原名漱春园，是清代皇帝的宫苑，是乾隆赏赐给和珅的。之后，和珅将漱春园改名为十笏园。据记载，它完全参照圆明园的布局模式，也有蓬岛琼台。岛东侧有石舫，石舫北侧是和珅姬妾们居住的“临风待月桥”，所用材料都采用广西深山老林中的楠木，十二个楼，楼楼相连，楼前伫立一尊高达二丈余的太湖石，“奇形不可名状，夹以老松二枝”，相传是派人以千金巨价由扬州盐商处买来的。十笏园里还建有一座钟楼。所供的不是传统的铜钟，而是一口西洋的巨型自鸣钟。潘德舆所著《乔一斋词》记载：“晨鸣 则群姬理妆”。这在当时连皇宫中也难以享受到。因十笏园贴近圆明园，乾隆也时时光临。据说，就在这园里游乐时，乾隆将最喜爱的十格格许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珅当权后为人奸诈，贪赃枉法，最终落得抄家赐死，十笏园也被抄没。在抄家单录上有“名园一座”（当今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虽系艺术夸张，但和珅的下场倒是事实）。和珅被抄没后，十笏园恢复漱春园名称，嘉庆帝分别赐与成亲王永理和十格格